

刘 瑜◎著

丁玲小说

女性意识解读

——1927—1948年间
丁玲小说中心话语走向论析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外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丁玲小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女性意识解读

——1927—1948年间
丁玲小说中心话语走向论析

刘 瑜◎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小说女性意识解读: 1927—1948 年间丁玲
小说中心话语走向论析/刘瑜著. —成都: 四川文艺
出版社, 2006
ISBN 7-5411-2456-7

I. 女... II. 刘... III. 小说—女性—人物形象—
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3117 号

DINGLING XIAOSHUO NÜXING YISHI JIEDU

丁玲小说女性意识解读

——1927—1948 年间丁玲小说中心话语走向论析

作 者 刘 瑜
责任编辑 谢明香
封面设计 任兆祥
内文设计 黄小骏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汪 萍等

书 号 ISBN 7-5411-2456-7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6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目 录

第一章 引 论	(1)
第二章 丁玲小说女性意识的张扬	(12)
第一节 从“女儿”到“女人”	(12)
第二节 商业化语境中女性的空洞能指	(51)
第三章 丁玲小说女性意识的失落	(82)
第一节 做和男人一样的人	(89)
第二节 自觉接受时代规范	(96)
第四章 丁玲小说女性意识的复苏	(109)
第一节 个人话语的“意外”回归	(111)
第二节 做人与做女人的双重困惑	(116)
第五章 丁玲小说女性意识的彻底消遁	(138)
第一节 女性意识的变迁	(139)
第二节 女性意识彻底消遁的标准文本	(144)
第三节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	(155)
第四节 在文学政治中心边缘的左右徘徊	(166)
第六章 结 语	(173)
第一节 丁玲小说文本寻绎的新文学意义	(173)
第二节 丁玲小说文本解读的女性文学史意义	(181)

第一章 引 论

1927年，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被誉为“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震惊了”^①，并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反响。在她接下来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丁玲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鲜明的艺术特色，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33年，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中国，问鲁迅最好的短篇小说作者时，鲁迅推荐了丁玲等七人，丁玲仅排在茅盾之后。^②丁玲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据不完全统计，丁玲的作品先后被译为英、俄、日、保、丹、罗、匈、波、朝、捷、德、巴（西）、法等二十几种文字，她的主要作品，甚至文论、回忆录等几乎全部译成了外文。^③不单是作品的艺术价值，丁玲还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先是以“表现心灵负着时代苦

①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23页。

② 林树明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01页。

③ 宋绍香《丁玲文学在国外》，《泰安教育学报》1999年第3期。

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①而登上文坛的时髦女作家，继而转变为共产党政权中最引人注目的左翼作家，然后被打成“右派”等，她的经历与其作品一块儿，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

伴随着丁玲处女作《梦珂》的诞生，丁玲的小说研究便拉开了帷幕。从我们可以见到有关丁玲的研究资料，最早的是毅真于1930年7月1日《妇女杂志》发表的《当代女作家论》^②，至今已七十多个年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批评家的研究文章里，丁玲及其作品被描述成各种各样的面貌：她或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女儿”、“新文学圈内的”主要核心作家，或被诋毁为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同样，她的作品，或被认为“社会价值大于其文学价值”，或被诬称流露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情绪。这种大起大落，变化不断的研究景观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尽管阐释的角度和结论可谓“异彩纷呈”，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漫长的丁玲作品阐释史中，有相当部分的评论家们始终注意到了丁玲作品中所呈现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围绕着这个特点，或是赞誉或是批评，构成了丁玲及其作品阐释史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为方便看到各个阶段作家对丁玲作品中呈现的这一特点

①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53页。

② 陆文采、贾世传《丁玲研究七十五年（1930—2004）的沉思——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的评价，我们大致可以把丁玲及其作品阐释史分为四个阶段。^①首先是1930年—1948年，在这一阶段中，除茅盾对丁玲创作中新女性精当的评价之外，还有钱谦吾、方英等。钱谦吾指出了丁玲从《梦珂》到《韦护》期间的创作“表现了一个新的女性的姿态，一种具有非常浓重的‘世纪末’的病态的气氛的‘所谓近代女子’的姿态”。^②方英认为丁玲笔下的女性新的姿态，在于“农村里的人是憧憬着城市，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又都感觉着生活的苦难”。丁玲的成功在于“很有力地描写了这样的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受到损害的女主人公们的心理上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她们怎样地突破了灭绝的理想，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的全部过程”^③。

1949年—1954年属于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丁玲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陈涌最早对该书进行了全面评价，他指出“对地主李子骏的女人，写她家里果树园被没收时她的心境”，作者“显然努力使自己设身处地的体会这个地主女人的灵魂的秘密，而真实地写出她在失势以后的绝望和怨恨，为我们展示了她全部的心理秘密”^④。

1955年，丁玲被文艺界打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

① 对四个阶段的划分参照了文采、贾世传《丁玲研究七十五年（1930—2004）的沉思——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26页。

③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37—242页。

④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306—311页。

团”；1957年，文艺界又把丁玲、冯雪峰打成最大的“右派”分子；1958年《文艺报》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文章进行了批判。所以我们将1955年—1978年理解为丁玲作品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周扬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不再是反封建礼教的“叛逆女性”，而“是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是个“善于说谎、欺骗、玩弄男性”的坏女人。《在医院中》里的陆萍，不是“干预生活”的战士，而“是个有着严重的反党情绪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①这种评价与第一阶段的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979年—1987年为丁玲作品研究的第四阶段。1979年丁玲作品研究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重新走向繁荣和开放。1980年，袁良骏的《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重新肯定了莎菲女士形象的艺术价值，指出“莎菲形象不仅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且是一个‘市侩’灵魂的惩罚者”。而严家炎更指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不仅以女性作家的特有敏感，而且以她强烈的现代意识”，“深沉地感受了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痛苦”，“并通过较成功的典型形象，深切、真挚地表现了这种痛苦”，进而指出“在写出（20世纪）20年代前期知识女性面临的痛苦这一点上，丁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②

1988年学者王雪瑛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论丁玲的

①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414—425页。

② 严家炎《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

小说创作》，文章指出自《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的创作“从《韦护》开始，便走上了失败之路，只有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的创作中，丁玲才显示了艺术个性的生命力”。“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①这种对作品内部的褒此贬彼，以及评价的尺度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丁玲研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对丁玲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思想，以及丁玲是否有女权思想，成为研究者的热门。1996 年在长沙举行的第七次学术讨论会上，以“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作为讨论的主题之一，就丁玲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是不是女性文学的开路人”展开了讨论，使丁玲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严家炎对会议期间双方的争论作了总结，他认为，“如果‘女权主义’指的是用理论、用行动追求男女平等的话，那么人们也许有理由把丁玲称做‘女权主义者’，然而用女权主义并不能涵盖丁玲的作品，丁玲的作品内容实际是在探索社会的解放……因而只提女权主义，实际上是限制和缩小了丁玲作品的思想意义。”^②

在这期间，谢冕在总结“新文学五十年”（1949—1999）得失时，对丁玲的创作做了总结：“我们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总看不到‘这一个’丁玲，而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看到了，尽管后者比前者写得早得多，是莎菲使丁玲在她

① 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上海文论》1988 年第 5 期。

② “丁玲与中国女性文学”编写小组《丁玲与女性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第 5—6 页。

的作品中和文学史中活着，而不是后来那些使她赢得了荣誉的新作。”^①

通过对丁玲研究四个阶段的大致描绘，我们可以感受到丁玲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描写一直是评论者所关注的重要对象。围绕着这个话题的或褒或贬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化因素是耐人寻味的。评论者从对丁玲笔下女性的考察，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丁玲性别身份对其创作的重要性。在这种体认下，丁玲前期所创作的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文本所具有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我们也看到，现阶段对丁玲的研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缺少对丁玲整体性的、历史性的、宏观性的考察和研究，一些作品的解读被忽略了，或者说其具有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这些是令人遗憾的，但同时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丁玲的新的“生长点”。

作为五四以后为数不多的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并在长时间内保持创作活力的女作家，丁玲的性别身份无论是对于考察她的创作还是她的经历都具有无法忽视的影响。作为革命政权组织建立过程中成就斐然的而经历复杂的女作家，她成为考察革命（阶级）与性别关系的一个难得的个案。

基于对丁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笔者试图将丁玲的作品纳入女性文学的范畴作一个全面的、历史的、整体的研究。这不是生硬地用女权主义来涵盖丁玲的作品，“限制和缩小了丁玲作品的思想意义”；而是试图用这一理论来烛

^① 谢冕《文学的纪念》（1949—1999），《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照丁玲的文学世界，使得丁玲文学世界中被遮蔽的部分重新放光闪亮，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洞悉其微妙幽深的文学世界。笔者认为这不仅仅符合丁玲的创作实际，而且是有益于推动丁玲研究的发展的。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如果真如此，女性文学就不仅丢失了其起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说不出的、以宽容面貌出现却内含性别歧视的意味。这亦是二十三四岁时，丁玲喊出“我卖稿子，不卖‘女’字”的心理原因。

女性文学既是性别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的这一悖论，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说明。概念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不是对等的，语言相对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种暂时、有待于发现的东西，因此，概念的意思常常是包含着悖论而有待发现、填充和更新的。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心意思只是一个差异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只是因为它不是其他符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相对稳定、准确地界定一个符号的意思，便应该把它相似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也就是要从该符号不是什么入手。

所以关于女性文学的悖论，意思是虽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概念为标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讨论“女性文学”时，一般认为应该是体现女性意识的作品。然而关于“女性意识”也很难明确下定义。因为，在几千年文化传统中，女性只是相对于男性存在的他者，“女性”的内涵常常

被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所填充。在五四先驱者的启蒙下，觉醒的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女性，可以清楚地说出我不是什么（不是别人的奴隶、附庸、玩偶），却难以从正面说出自己究竟是什么。不过，从不同论述中，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女性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指女人作为人的主体性，而女性意识则是指女性自己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它力求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即立足于女性去感知、体验人生与世界，传达女性的欲望与追求，肯定女性的经验与价值。在此基础上，女性文学概念的质的规定是女人作为创作主体、言说主体在文学中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位置的探寻”。^①

自从中国有了阶级的政党和阶级的革命，女性文学书写便悄悄地出现了分立即女性意识为主导意识形态（民主意识、国家意识、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所统摄的“女国民化”的文学书写、超越主导意识形态并具有广泛意义和永恒价值的纯然女性化的文学书写。从某种意义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书写的历史，也是纯然女性化与女国民化两种文学书写越来越明晰地走向分立的历史。

笔者以为，丁玲早期的文学道路迅速而生动地展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轨迹。她以自己觉醒了的女性意识去体验周遭的世界，为妇女的生存和遭遇的不公而呐喊，积累了作为女性的艰难坎坷的个人经验及对女性群体孜孜不倦的思索，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文学视角和天地——超越主导意识形态而纯然女性化的文学书写，表达了她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挑战的勇气和力量。这种超越主导意识形态而纯然女性化的

① 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文学书写为女性文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在于刻画了一批具有真正性别内涵的“女人”形象。她们开始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对自己、对异性的审视以及对社会关系的洞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笔者将之与五四初期“浮出历史地表”的第一批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细致比较，揭示出丁玲塑造的“女人”形象的可贵。此外，丁玲还以边缘化的女知识分子的视角去观察、感受都市，将切肤之痛的都市体验直接灌注到作品中，开启了对都市商业化语境下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

20世纪30年代初，丁玲悄然收回了进行自我审视和灵魂拷问的女性目光，把文学视线投向革命和大众。《韦护》以革命与恋爱对立模式的设计与“莎菲们”划清了界线，标志着丁玲开始主动放弃纯然女性的立场，以“女国民”的姿态进入文学书写。丁玲分为之一和之二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虽然仍在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以革命和不革命的截然划分，规定了女性与男性形象塑造的正反方向。到了《田家冲》、《水》时，丁玲的文学书写又在革命的意识里增加了大众的投影和分量。之后，丁玲在国家/政治意识的统驭下在《某夜》、《消息》等篇中直接书写革命者的就义和大众对革命的理解与向往。抗日战争的爆发则使她坚持的女国民化的文学书写进一步为民族/国家意识所统驭，写出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压碎的心》等宣传抗日思想的作品。尽管丁玲逐渐向左翼文学家的立场转变，但是残留的旧女性意识，与新的“革命”的思想的交织、撞击，敏感、细致的艺术家天性与理性、客观的左翼文学家的立场的互逆、交战，构成了丁玲复杂而痛苦的心灵图景，这也是笔者所力图

展现的多层次的、立体的、活生生的文学景观。

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文学时代的全面“沉思”,丁玲的创作也曾酝酿着某种反思。于是,一系列对解放区文坛来说实属不寻常的新奇之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诞生了。说是新奇,其实是丁玲非常自觉地把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个体经验,融入到通常属于社会政治问题“妇女问题”的思考中。然而,丁玲延安时期女性话语的短暂回归,伴随着《风雨中忆萧红》的微弱叹息,逐渐中断,她在创作中彻底放弃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特征,消解了女性主义立场上的批判锋芒,在对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民族/国家的理性逻辑和本体价值的认同中,成为了一个革命现实主义的女国民作家。从此,给她带来荣誉并得到首肯的是女国民的文学书写,相比之下,女性的文学书写带给她的则是被否定和被批判。

纯然女性的文学书写所遭到的否定、批判、冷落与女国民文学书写所获得的殊荣,不仅仅是丁玲一个人的不幸或幸运。在权威意识形态的价值圈定中,“丁玲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麻木了“子宫之笔”,充分展示各自女国民姿态下的书写才华,使曾经分立的女性书写世界发生了群体意义的向着“女国民”一方倾斜。

丁玲作为一位独特的女性作家,一位在民族历史面临重大危难关头能够肩负重苦重难而保持一份独立和清醒的知识女性,其作品始终占据着一种民族主流意识的显赫位置。丁玲这一期间所作的人生与创作文本选择,虽然只是一个个案,然而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蕴涵着中国一群追随主导意识形态女性知识分子的必然命运和归宿。本文试图将丁玲创

作中女性意识之消长，放置在整个民族文化的评定变化中去辨析，将丁玲女性意识的个体发展置于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文明进程中去认识，并试图结成联系着女性意识嬗变的历史链条，以求发掘出这一链条每一环节的意义和作用，以期从这一角度贴近丁玲，走进丁玲的文学世界。

第二章 丁玲小说女性意识的张扬

丁玲小说所提供的女性文学甚至文坛的新的贡献在于其所塑造的新的女性形象。所谓“新”，正是与五四初期“浮出历史地表”的第一批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相比较而言的。其新之处，首先在于她的笔下诞生了一批具有真正性别内涵的“女人”形象。她们开始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对自己、对异性的审视以及对社会关系的洞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其新之处的第二个表现在于，开启了对都市商业化语境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第一节 从“女儿”到“女人”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自父系统治秩序建立以来第一个绝无仅有的、不含子承父位意味的弑父时代。经历了这两次革命之后，父系统治秩序无论在政权——政治体制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失去了维系自身

的能力，在男性新文化先驱的疾声呐喊下，旧中国女性的命运和少年中国新女性的出路问题提上了文化议事日程。激烈的反传统的新文化养育了一代人，“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大旗吸引着一批女性勇敢的走出家庭、背叛角色，争取自由。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群女作家登上历史舞台，以笔创造着自己新命运的第一步。

现在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无论在“写什么”和“怎样写”，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首先，她们在小说中涉及的问题，比如说女子解放、男女平等、家庭改组、女子人格、女子社交、女子贞操等，虽然包含着妇女解放之意，具有鲜明的性别针对性，但基本上都融入了“打倒孔家店”、“科学与民主”、“恋爱自由”等时代主题，其在性别层面上具有的特殊性，所包蕴的女性的隐秘经验，包括历史经验、心理和生理经验，只是触及到而已，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和展开。

从她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女作家是以一种崭新的女儿姿态为开端的。她们的主要作品中总是活跃着一位甚至几位女儿主人公，其身份多是学生。在一些作品中，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与人物、叙述者有着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冰心的《秋风秋雨秋煞人》中，读者可以看到冰心直接充当女友英云、淑平的悲剧命运的见证者；而庐隐，则把自身的生命经历直接融入到了作品《海滨故人》当中。在作品中，作家描绘出女儿在传统禁令下的反传统的爱情，她们的内心理想与外在压力的交战，步入成熟后面临的矛盾和选择以及无可选择的规避，女儿们与双亲之间观念的冲突与亲情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生活命运的思索、向往、担忧、恐惧